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日本近代对中国边疆调查
及其文献研究

袁向东 张明杰 主编

东北 侦探记

(日) 菊地节藏 等著

张小兰 译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日本近代对中国边疆调查
及其文献研究

袁向东 张明杰 主编

东北 侦探记

(日) 菊地节藏 等著

张小兰 译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北侦探记/ (日) 菊地节藏等著; 张小兰译.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8. 12

(日本近代对中国边疆调查及其文献研究/袁向东, 张明杰主编)

ISBN 978 - 7 - 5668 - 2520 - 9

I. ①东… II. ①菊…②张… III. ①东北地区—地方史—近代 IV. ①K2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4102 号

东北侦探记

DONGBEI ZHENTANJI

著 者: (日) 菊地节藏 等 译 者: 张小兰

.....

出 版 人: 徐义雄

策划编辑: 潘雅琴

责任编辑: 李倬吟 黄文科

责任校对: 高 婷

责任印制: 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排 版: 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225 千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 5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总 序

中日交往，源远流长。千百年间，日本曾视中国为“圣人之国”“礼仪之邦”。然步入近代，中国却变为日本侵略扩张的标的。在以西学为范本的近代学术的诸多领域，也是日本人着了先鞭。早在清末民初，日本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就到中国各地，从事形形色色的调查及其他活动，并留下了为数众多的调查报告、见闻游记等文献资料。

仅就调查活动而言，既有出于政治与军事目的的侦探，包括兵要地志、政情民俗、商贸经济、民族文化、社会风貌等，也有以所谓学术考察为名的各种调查，如考古发掘、民族宗教、地质地理、建筑美术等。就笔者所见所知，这类调查文献大小小数以千计，仅涉及东北和内蒙古（日本所谓“满蒙”）地区者，就多达两三百种。若加上那些秘不示人或已焚毁的机密报告等，近代日本人涉及我国边疆地区的调查、游记等文献资料，其数量之多，可想而知。

这些文献资料对于我们解读近代中日关系，考察日本人清末民初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及其对中国的认识至关重要。同时对弥补和丰富我国的边疆史料，再现边疆地区的社会风貌及历史断面，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军事侦探

在这类文献资料中，最早的应属军事侦探类。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即现觊觎中国之心。早在1872年8月，日本政府就派遣池上四郎少佐、武市熊吉大尉及外务省官员彭城中平三人，秘密潜入我国东北地区，从事侦探活动。为掩盖军人身份，两名军官暂被委任为外务省官员。他们改名换姓，乔装成商人，从营口到沈阳等地，对辽东半岛及周边地区的地理兵备、政情风俗等进行侦探调查，翌年回国后，提交了由彭城中平起草的《满洲视察复命书》。此乃近代日本人最早的对我国的调查报告。

1873年后，日本政府有组织地将部分陆海军官分批派往中国，从事侦探谍报

活动。如1873年末派遣以美代清元中尉为主的8名军官，1874年派遣以大原里贤大尉为首的7名军官等，即早期所谓“清国派遣将校”之实例。这些人打着留学来华学语言的旗号，其实所接受的指令是“搜集情报”，是对我国与朝鲜、俄国接壤的东北地区和内陆、沿海各省，以及台湾等地进行调查。1875年，日本驻华公使馆开始常驻武官，福原和胜大佐上任后，负责监督和指挥在我国日本军官的行动。1878年，随着日本参谋本部的设立，以军事侦探为目的的军官派遣体制得以确立，派遣及侦探活动也更为组织化、规模化和具体化。分期分批派遣的军官以营口、北京、天津、烟台、上海、汉口、福州、广州、香港等为根据地，对我国诸多省区进行广泛而又缜密的调查，范围不仅仅是东北、华北、华中及南方沿海诸省，而且扩展到陕甘内陆、新疆及云贵等边疆地区。如常驻北京的长濑兼正少尉曾潜入甘肃区域，大原里贤大尉曾深入川陕地区，小田新太郎大尉曾入川鄂云贵地区，从事密探活动。1886年奉命来我国的荒尾精中尉，以岸田吟香经营的乐善堂为据点，纠集一些所谓“大陆浪人”，对我国内陆省份及新疆地区进行侦探调查。其谍报活动后由退役军官根津一继承，日后设立日清贸易研究所，后又发展为东亚同文书院，成为培养和造就情报人员之摇篮，调查和搜集中国情报之大本营。

这些派遣军官定期向日本政府及有关组织发送情报，不少人还留下了详细的侦探日志、调查复命书及手绘地图等。如岛弘毅的《满洲纪行》、梶山鼎介的《鸭绿江纪行》等，即为其中的调查报告。后来，日本参谋本部编纂《中国地志》（总体部，1887）、《满洲地志》（1889）和《蒙古地志》（1894）等文献时，曾参考了这些军官的实地调查记录。部分军官还直接参与了编纂和校正工作。这些地志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地理志，而是带有强烈军事色彩的兵要地志，而且完成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遗憾的是，除部分已公刊的之外，不少文献已无从获知其下落。只有当时的手绘地图，“二战”后为美军所扣押并运往美国，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另外，中日甲午战争后，由日本参谋本部牵头实施的对我国的地图测绘及侦探活动，更是触目惊心。《外邦测量沿革史》（3卷，参谋本部·北中国方面军司令部编，1979年复制版）、《陆地测量部沿革志》（陆地测量部编，1922）、《参谋本部历史草案》（7卷+别册，广濑顺皓主编，2001）以及《对支回顾录》（上下卷，对支功劳者传记编纂会编，1936）、《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中下3卷，葛生能久主编，1933—1936）等文献，可资参考，在此不赘。

1879年,东京地学协会成立。它比我国地学会的诞生(1909)足足早了30年。该协会以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为蓝本,名义上以“普及地理学思想”为宗旨,实际上则是倡导和实施海外(尤其是中国和朝鲜)“探险”及调查,为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服务。发起人及中心成员有渡边洪基、长冈护美、榎本武扬、花房义质、锅岛直大、北白川能久、细川护立、桂太郎、北泽正诚、山田显义、曾根俊虎等,多为皇亲贵族、政治家、外交官和军人。该协会除直接派遣人员赴海外调查,搜集情报资料之外,还定期举办演讲会,发行协会报告,1893年与东京大学地学会合并后,以该会的《地学杂志》作为其会刊逐月发行。

翻检日本早期的演讲报告,则知其多为有关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及南洋诸国或地区的探查记录。其中涉及中国边疆的,除上述岛弘毅《满洲纪行》(1879/4)、梶山鼎介《鸭绿江纪行》(1883/4)之外,还有谷川宣誉《辽东日志摘要》(1879/5),福岛安正《多伦诺尔纪行》(1881/2),《亚细亚大陆单骑远征记》(1893/7),山本清坚《从哈克图到张家口·上海》(1882/12),菊池节藏《满洲纪行》(1886/4),长冈护美《清韩巡回见闻谈》(1895/6),铃木敏等《金州附近关东半岛地质土壤调查报告》(1895/5),神保小虎《辽东半岛巡回探查简况》(1895/10)、《辽东半岛占领地之地理地质巡检报告》(1896/10、1897/2)等。这些报告者大多为陆海军军官及政治家。可见,该协会自成立之初,就显露与国家对外扩张政策相呼应的特征。

在我国边疆地区从事侦探调查的,除军人外,还有一些外交官、记者及“大陆浪人”等。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有:西德二郎《中亚纪事》(1886),永山武四郎《周游日记》(1887),小越平陆《白山黑水录》(1901),植村雄太郎《满洲旅行日记》(1903),中西正树《大陆旅行回顾》(1918),日野强《伊犁纪行》(1909),波多野养作《新疆视察复命书》(1907),林出贤次郎《清国新疆旅行谈》(1908),竹中清《蒙古横断录》(1909),深谷松涛和古川狄风《满蒙探险记》(1918),星武雄《东蒙游记》(1920),吉田平太郎《蒙古踏破记》(1927),副岛次郎《跨越亚洲》(1935),米内山庸夫《云南四川踏查记》(1940)、《蒙古风土记》(1938),成田安辉《进藏日记》(1970年公开),矢岛保治郎《入藏日记》(1983年公开),野元甚藏《西藏潜行——1939》(2001),木村肥佐生《西藏潜行十年》(1958),西川一三《秘境西域的八年潜行》(1967)等。

其中,军人出身、后转为外交官的西德二郎(1848—1912),1880年7月从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出发,经吉尔吉斯斯坦、塔什干、撒马尔罕等地,进入中

国新疆伊犁，后经蒙古、中国北部边疆及上海，于1881年4月返回东京，历时9个月，踏查了对当时日本人来说尚属秘境的俄属中亚和我国新疆地区。《中亚纪事》（上下卷，陆军文库，1886）即此次探险调查之记录。书中记述了作者所经之地的山川地理、气候、民族、人口、沿革、物产、贸易、风俗及动植物等，尤其是对中俄边境地区的实况等多从军事角度作了观察和记述。此书是近代日本人最早涉及我国新疆踏查的文献之一，对近代边疆尤其是西域探险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二、所谓“学术调查”

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也有部分日本人来我国从事某些领域的考察，但真正的“学术调查”，主要还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近代日本人对我国的学术考察，几乎都与日本侵略扩张的国策并行不悖，只是有的明显，有的隐秘而已。有些完全是打着学术旗号的国策调查，有些则是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的越境活动，甚至那些标榜目的较纯粹的宗教探险或学术考察，也都与国家的扩张政策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因此，这里的“学术调查”是应该加引号的。

甲午战争后，出于侵略扩张与殖民统治的需要，日本加紧了对我国的调查与研究，一些机关、学校、宗教团体、学术机构或个人也纷纷行动起来，开展实地考察等活动。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前述的东京地学协会，1884年成立的人类学会（后更名为“东京人类学会”），1896年成立的考古协会（后改称“日本考古协会”）以及东西两本愿寺等组织和团体即其中之代表。

1895年，受东京人类学会派遣，年仅25岁的鸟居龙藏前往我国辽东半岛作考古调查，事后，于东京地学协会作了《辽东半岛之高丽遗迹与唐代古物》（1896/5）的演讲报告。可以说，这是日本人类学或考古学者赴我国调查之嚆矢。此后，他又先后四次被派往我国台湾，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台湾岛及当地居民作实地考察。1902年7月，为开展与台湾的比较研究，鸟居又深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对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考察。事后，撰写了《清国四川省蛮子洞》（1903）和《苗族调查报告》（1905）等。后者堪称近代第一本有关我国苗族的田野调查著作，至今仍为学界所重。他此次调查活动本身，对当时及后来的我国民族研究学者也有很大触动，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学者对西南边疆民族的实地调查与研究。

1902年3月,身为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副教授的伊东忠太,为研究和探索日本建筑艺术的发源及其与外国的关联,对我国及印度等地的建筑进行长达两年多的实地考察。他先到北京,然后经山西、河北、河南,西至陕西、四川,再穿越湖北、湖南,入贵州,最后从云南出境。历时一年,纵贯我国大陆南北,考察后撰写了多种学术报告、旅行见闻等。其中《川陕云贵之旅》《西游六万里》等著述,是涉及我国边疆的重要记录。

1902年11月至1904年1月,工学博士、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山田邦彦等奉命赴长江上游地区,对四川、云南、贵州及川藏边境作地质矿产调查。回国后,于《地学杂志》发表《清国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旅行谈》(1904)。但其日记等尚未整理发表,山田即不幸病逝。后由东京地学协会征得其家属同意,将日记及当时拍摄回来的照片稍作修正,以遗稿形式出版了《长江上游地区调查日志》(附照片集,1936)。在日志中,不仅有所到之地的气候、地形地势、水文矿产等资料的详细记录,而且还有大量的测绘地形图等,再加上174幅原始图片,可谓了解上述地区地理地貌、矿产资源及风土民情等的难得资料。

在言及日本近代对我国边疆调查时,不能不提到“大谷探险队”及其他“僧侣”的特异活动。在近代西方殖民主义风潮的刺激下,为调查和探明佛教流传的路径,同时也是为了呼应日本对外扩张的国策,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大谷光瑞(1876—1948)于1902年至1914年间,曾先后三次派遣年轻僧侣,对我国新疆等地进行探险考察。世间将他们俗称为“大谷探险队”。其考察活动成果除所获文物外,考察亲历者还留下了大量的纪行、日记等文献资料。大谷家藏版《新西域记》(上下卷,1937)和《西域考古图谱》(2册,1915)等,即其中之代表。这类文献资料具体有:大谷光瑞《帕米尔行记》,橘瑞超《中亚探险》《新疆探险记》,渡边哲信《西域旅行日记》《中亚探险谈》,堀贤雄《西域旅行日记》,野村荣三郎《蒙古新疆旅行日记》,吉川小一郎《天山纪行》《中国纪行》,前田德水《云南纪行》《从缅甸到云南》,本多惠隆《入新疆日记》等。

另外,近代日本已涉足我国西藏,曾多次派僧侣等潜入西藏从事调查活动。如河口慧海(1866—1945),1897年6月从日本出发,经我国香港及新加坡,抵印度加尔各答。他在印度及尼泊尔等地停留,准备了近三年时间后,于1900年7月进入西藏,翌年3月成功抵达拉萨,成为第一个进入西藏拉萨的日本人。他隐瞒国籍和身份,于当地滞留一年多时间,后因身份败露,于1902年5月底仓皇逃离。两年后,他又离开日本,于印度、尼泊尔等地滞留近十年后,再度进入西藏,

并得到达赖喇嘛赠的百余函《大藏经》写本。两次入藏，河口慧海都留下了详细的旅行记录。第一次入藏记录《西藏探险记》，是以其口述形式连载于日本报刊的，长达一百五十余期。后由博文馆编辑出版了两卷本《西藏旅行记》（1904）。该书曾多次再版，使河口慧海的名字连同“神秘西藏”一起蜚声日本。尤其是1909年该书英文版（*Three Years in Tibet*）的问世，更是使其名噪一时。第二次入藏的记录《西藏入国记》和《入藏记》，同样以报刊连载的形式于1915年推出，后辑录为《第二次西藏旅行记》出版（1966）。

除河口慧海之外，寺本婉雅（1872—1940）、能海宽（1868—1901）等也是早期涉足西藏的日本人。寺本婉雅先后两次进入西藏，而且还曾奉军方之命，于北京从事政治活动，并成功地将两套贵重的《大藏经》运往日本。他第一次入藏是1899年，于打箭炉邂逅同为东本愿寺派遣的僧侣能海宽，两人欲由此进入西藏，但因当地官民阻拦，游历理塘和巴塘后返回。不过，能海宽仍不死心，接着又企图由甘肃、青海远道入藏，但终究未果，再后来决意由云南入藏，不料在中途成了不归之客。其入藏记录有《能海宽遗稿》（1917）、《入藏途中见闻杂记》等。

寺本婉雅第二次入藏是受日本政府派遣，于1902年10月从北京出发，经张家口、多伦诺尔、包头、西宁等地，翌年2月抵著名藏传佛教寺院——塔尔寺，在当地居留两年后，独自进入西藏，并于1905年5月抵达其向往已久的拉萨，后自印度归国。1906年4月，返回日本不久的他再度接受政府指令，第三次踏上入藏旅途。不过，这次他主要是在青海活动。记述以上三次进入西藏或青海活动的是其《蒙藏旅日记》（横地祥原编，1974）。书后还附录《五台山之行》《西藏大藏经总目录序》《达赖喇嘛呈赠文原稿》《西藏秘地事情》《回忆亚细亚高原巡礼》等。除西藏、青海部分之外，尚有不少涉及当时北京及沿途各地政治、外交等领域的史料，都是研究日本涉藏史乃至中日近代史的重要文献。

这方面的资料还有青木文教《西藏游记》（1920）、《西藏文化新研究》（1940），多田等观《西藏》（1942）、《西藏滞在记》（1984）等。

日俄战争结束后，伴随着日本殖民政策向我国东北及内蒙古等地的重点转移，各种形式的中国内地“学术调查”更是有恃无恐地开展起来。满铁调查部（1907年设立，下同）、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1907）、东亚经济调查局（1908）、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1908）、东亚同文书院（1900）等国策机构，以及其他一些调研组织等也应运而生。加上原有的那些学校、机关或团体，一时间，对我

国，尤其是对东北及内蒙古等边疆地区的实地考察或研究成为时尚。

前述鸟居龙藏的所谓“满蒙探察”即其中之代表。截至中日战争爆发，他曾先后十余次到上述地区从事调查。具体地讲，东北9次，内蒙古4次。除1906年前后随夫人赴内蒙古喀喇沁王府任职时的调查之外，几乎每次都是受组织派遣而为，有些调查是在日本军方协助下实现的。加上他及时采用从西方导入的所谓近代科学方法，每次调查均有一定收获或新发现。如1905年于普兰店发掘到石器时代遗迹，于辽阳发现汉代砖墓。1909年调查东北地区汉代坟墓之分布。1928年，于吉林敦化发现辽代画像石墓穴。多次于内蒙古考察辽上京、中京遗址及辽代陵墓，发现一些包括石像在内的遗物等。对辽代文化遗迹、遗物等的发掘和发现，是他这些调查中的最大收获。后来结集出版的《辽之文化图谱》四大册，虽然只是调查成果的一部分，但足见其研究价值。关于鸟居对我国的调查足迹，可从以下旅行记录中得到探明：《蒙古旅行》（1911）、《人类学上所见之西南中国》（1926）、《满蒙探查》（1928）、《满蒙再访》（与妻子合著，1932）、《从西伯利亚到满蒙》（与妻子合著，1929）等。

不可否认，鸟居的这些实地调查及成果，在我国迟于日本而引入的某些西方近代学科领域，有的是先行了一步。今天我们在梳理或讲述这些学科史时，也不得不提到他的先行调查和研究。另外，鸟居从调查我国台湾时起，就携带着当时尚极为稀少的照相机，拍摄并留下了众多珍贵照片。这些图像资料在时隔近百年的今天来看，尤为宝贵。鸟居去世后，后人编辑出版的《鸟居龙藏全集》（12卷+别卷，朝日出版社，1975—1977），至今仍为学界重视。在诸多著名学者著述或全集日趋低廉的当今日本古旧书市场，唯独鸟居的著述和全集售价坚挺，甚至有日益高涨之感。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其学术价值。另外，鸟居龙藏的夫人——鸟居君子（1881—1959）曾接替河源操子（著《蒙古特产》），于1906年3月赴内蒙古喀喇沁王府毓正女学堂任教。她利用此机会及多次旅行，对蒙古族历史文化、社会风习、宗教信仰等加以考察，后撰写《民俗学上所见之蒙古》（1927）一书。内容包括蒙古族的语言、地理人情、风俗习惯、遗迹文物、牧畜、宗教、美术、俚语、童谣等，是了解当时蒙古地区社会生活及文化状况的难得文献。书中还附有当时拍摄的照片或素描插图200余幅。

东京地学协会自1910年起，又独自开展了大规模的所谓“清国地理调查”，耗费巨资，历时6年。先后派遣石井八万次郎、野田势次郎、饭塚升、小林仪一郎、山根新次、福地信世等地理学者，对我国长江流域及南方诸省区进行广泛调

查。事后，编纂出版了三卷本《中国地学调查报告书》（1917—1920）和《化石图谱》（1920）。该报告书中既有调查者的“地学巡见记”，又有调查区域的地质、地理、水文、古生物等记录，内容十分翔实，而且配有很多手绘地图和实地图片。

至于前面提到的满铁调查部、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等国策机构涉及我国边疆的调查及其资料，更是多不胜数，限于篇幅，在此不予详述。仅举满铁调查部组织实施的众多调查中之一项为例。1922年5—6月，受满铁调查部之委托，考古学者八木槌三郎对沈阳以南大连铁道沿线地区进行实地探索，后参考其他文献，编写出版了《满洲旧迹志》（1924）。该书对东北地区各时代之遗物、遗迹，尤其是寺庙道观及其建筑等，均作了具体记述和考察，与村田治郎后来编写的《满洲之史迹》（1944）一起，成为了解东北文物史迹的代表作，同时，也为我们研究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实地考古调查提供了一份实证材料。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期，又有东亚考古学会（1927）、东方文化学院（1929）、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1931）等相关学术机构或团体诞生，日本对我国边疆，特别是所谓“满蒙地区”的“学术调查”及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中，考古调查尤为突出。在此领域扮演主要角色的即以东（东京）西（京都）两所帝国大学考古学者为首的东亚考古学会。该学会凭借日本军政界的后援和充足的资金，又打着与中国考古学界合作的旗号，无视中国主权，对我国东北及内蒙古等地的古代遗迹，先后多次进行大规模的发掘调查。如1927年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对旅大貔子窝遗址的发掘、1928年对牧羊城遗址的发掘、1929年对老铁山山麓南山里汉代砖墓的发掘、1933年对旅顺鸠湾羊头洼遗迹的发掘、1933年及1934年两度对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东京城）遗址的发掘、1935年对赤峰红山后遗迹的发掘等。发掘后的调查报告由该学会以“东亚考古学丛刊”的形式出版，其中甲种6大册、乙种8册。前者依次为《貔子窝》（书名副题省略，下同，1929）、《牧羊城》（1931）、《南山里》（1933）、《营城子》（1934）、《东京城》（1939）、《赤峰红山后》（1938）；后者涉及边疆者有《内蒙古·长城地带》（乙种1，1935）、《上都》（乙种2，1941）、《羊头洼》（乙种3，1943）、《蒙古高原〈前篇〉》（乙种4，1943）、《万安北沙城》（乙种5，1946）。另外，该学会还编辑出版了《蒙古高原横断记》（1937）等调查日志和研究论集《考古学论丛》（1928—1930）等。上述数目众多的调查报告在日本被誉为“奠定了东亚考古学基础”的重要文献。

东方文化学院更是由日本官方主导的对我国进行调查研究的机构，属于所谓

“对华文化事业”之一部分，分别于东京和京都设有研究所。其评议员、研究员等主要成员，几乎囊括了当时整个日本的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权威或骨干，如池内宏、市村瓚次郎、伊东忠太、关野贞、白鸟库吉、宇野哲人、小柳司气太、常盘大定、鸟居龙藏、泷精一、服部宇之吉、原田淑人、羽田亨、滨田耕作、小川琢治、梅原末治、矢野仁一、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桑原鹭藏、塚本善隆、江上波夫、竹岛卓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日比野丈夫等。若列举受该组织派遣或委托赴我国从事调查研究的人员，仅其名单就需要数页纸才能列完。为数众多的是对我国的调查及成果，内容也涉及方方面面，其中与边疆有关的调查文献资料主要有伊东忠太《中国建筑装饰》（5卷，1941—1944），常盘大定和关野贞《中国文化史迹》（12卷，1939—1941），关野贞《中国的建筑与艺术》（1938），关野贞和竹岛卓一《辽金时代之建筑及其佛像》（上下卷，1934—1935），原田淑人《满蒙文化》（1935），竹岛卓一和岛田正郎《中国文化史迹·增补（东北篇）》（1976），佐伯好郎《景教之研究》（1935）、《中国基督教研究》（3卷，1943—1944），驹井和爱《满蒙旅行谈》（1937），池内宏、梅原末治《通沟》（上下卷，1936）等。

中日战争爆发后，为实现彻底征服中国，进而侵占整个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野心，日本以举国之力、物力和财力，投入侵华战争中。此时，学界及研究界更是身先士卒，主动配合国策，积极参与对我国的各种调查与研究。先后设立的东亚研究所、太平洋协会、回教圈研究所（以上为1938年设立）、民族研究所（1943）、西北研究所（1944）等国策学术机构，均为涉及中国边疆调查的核心团体。如东亚研究所就曾开展过许多对我国边疆的调查与研究，其成果大多成为日本制定国策时的基础资料。笔者手头有一本盖着红色“秘”印的《东亚研究所资料摘要》（全书共238页），编刊于1942年，是该研究所登录资料之目录或简介。包括“甲、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乙、本所员调查报告书”“丙、中间报告、翻译乃至部分性成果资料等”“丁、委托调查报告书”“外乙、本所讲演速记”等，资料所及区域涵盖中国内陆及边疆省区，另有“南洋、近东、苏联、外蒙”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资源、外国对我国的投资、黄土调查、满蒙关系、海南岛关系等。又如民族研究所从1943年成立，至1945年日本战败，短短两三年时间，不仅从事过大量服务于国策的文献研究，而且还奉政府及军方之命，对从东北到西南的我国边疆省区进行了多项调查，甚至于1944年组派两个调查团，奔赴内蒙古和新疆等地进行民族宗教文化探查。

以上只是对日本近代对我国的“学术调查”作一简单而又部分性的回顾和介绍。这类调查涉及面宽广，文献资料浩瀚庞杂，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全面涉及。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以甲午和日俄两大战争为契机，为响应或配合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日本人对我国的“学术调查”逐步开展起来，并日益活跃。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政府所谓“对华文化事业”的实施及受其刺激，东亚考古学会、东方文化学院等国策学术机构先后成立并迅速行动起来，尤其是当伪满洲国建立后，在所谓“满蒙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发掘调查。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学者更是主动配合国策，奔赴我国各地从事调查研究等活动，以实际行动实践所谓“学术报国”。因此，可以说，近代日本人对我国的“学术调查”或研究从初始阶段即有扭曲的一面，尽管在方法上有其科学的成分，在成果方面也有值得肯定或可取的地方，但是总体上难以否认其充当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生产工具之本质。

“二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对其战前的所作所为，虽有部分反思或批判的声音，但整体上并没有作深刻反省和彻底清算，甚至至今仍有全盘肯定或肆意讴歌者。对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日本战后中国学研究，笔者认为，在不少方面需要有批判性眼光或谨慎判别、正确对待之态度。对战前的“学术调查”这一正负兼有的遗产，更应有这种眼光或态度。

笔者一直致力于收集或考察近代日本人的涉华文献资料，而近代日本人涉华边疆调查或纪行资料，从文献角度来讲，价值很大，故多年来一直想着把这些文献择优译介出来。此次承蒙暨南大学出版社为该项目申请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终成此事。

张明杰

2015年10月

译 序

《东北侦探记》是由《满洲纪行甲》《满洲视察复命书》和《满洲旅行日记》(以下简称《纪行甲》《复命书》《日记》)三份资料合译而成,翻译时所用版本如下:《复命书》见《明治百年史丛书》之《西南记传》,《纪行甲》见参谋本部发行的内部书刊,《日记》则取自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电子版。

从1872年的《复命书》到1903年的《日记》,《东北侦探记》一书前后跨越了30余年,这30余年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到它的全盛期,在日本近代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但是,我们在研究近现代史的时候,总会发现那些万恶战争的根源也都可以追溯到这个“辉煌”的时期。译者在翻译这三份资料时,注意到作者大都是军人,而且大都是政府派遣的,虽然他们并非高官,也没有政策决定权,但译者还是对他们的这些侦察结果和他们对清朝的认识在日本的“大陆政策”里有没有起到作用很感兴趣。顺着这个思路,译者做了一点整理工作。

1872年提交《复命书》的三位“侦察员”为池上四郎、武市正干、彭城忠平。

池上四郎,又叫池上贞固,1842年出生于鹿儿岛,岛津藩士,历经戊辰战争各战。1869年任鹿儿岛常备队教佐(常备队官职:大队长、教头、教佐、小队长、半队长、分队长),1871年任近卫陆军少佐,正7位。1872年奉命视察满洲,1873年回国复命后因西乡隆盛^①倒台而随之辞职回乡,1877年死于西南战争,时年36岁。归乡后的活动,文献记载不同。《西南传记》说他效力于明治七年(1874)西乡在鹿儿岛设立的私立学校,而《池上四郎年谱》却说他并不看好这所由步枪学校和炮队学校组成的军事学校,而且当时他正在生病,没有参与建学一事。池上的父亲是岛津家的伺医,池上是长子,本应继承家业,但他不喜欢医学,总是跟着西乡等人舞刀弄枪,又常常到当时的政治中心江户打探形势、收集

^① 西乡隆盛(1827—1877),现鹿儿岛人,明治时期政治家,陆军大将。在王政复古政变、江户无血开城等事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岩仓具视出使外国时,担任留守政府负责人。1873年因征韩论下台。1877年发动西南战争,失败后自杀。

情报，当西乡等人在军事上拿不定主意时，他总是能出一言之力。西乡评价他“智谋之周密可谓张子房第二”。池上在提交《复命书》时对清朝的形势是这样分析的：“尽管盛京将军频繁地上奏要求改革兵备，但积弊已久，士气腐败，士兵既胆小又懒惰，常备兵有名无实，再加上没有纲纪，官吏公开贿赂，商民怨声载道。如此，不用几年，清朝就将土崩瓦解。我们要解决朝鲜问题的话，现在是最好的时机，这个机会将一去不复还。”

武市正干，又叫武市熊吉。1842年出生于高知县，土佐藩士，学武于致道馆。戊辰战争时活跃在板垣退助^①麾下，转战各地，屡立战功。传记里说他在侦察方面机智非凡。1871年任陆军大尉。1872年特任为外务省出仕，和池上四郎一起赴满洲侦察。1873年回国复命后，正值征韩论派下台，这使摩拳擦掌的征韩论派士族大失所望，他们视右大臣岩仓具视^②为内治派的罪魁祸首，策划暗杀行动。1874年1月武市和高知县士族等9人在赤坂袭击岩仓乘坐的马车，岩仓逃脱，暗杀未成功，而武市等人被捕处斩，时年34岁。

彭城中平，又叫彭城大次郎。肥前人士，1832年出生在长崎唐通事家庭。先祖是江苏淮安人刘凤岐，刘氏的第二代改姓彭城，彭城中平为第11代后人。明治初期唐通事多被外务省任用，活跃在近代外交舞台上。彭城家在一次大火中被烧毁，于是彭城中平也上京当了权中录，1872年被派作翻译兼文书随池上、武市前往满洲侦察。传记中说他是明治初期的探险家，但未找到有关记录。1874年，日本进攻台湾时，在台湾死于疟疾的日本兵多达560人。据《唐通事家系论考》（长崎文献社，1979）及亚洲历史资料中心 C04026795800 记载，他是其中之一。卒时42岁。

以上三人是最早潜入我国大陆的日本“侦察员”。

早在1871年，江藤新平^③就提出向清朝派遣佛教徒，目的是安插间谍，为实

① 板垣退助（1837—1919），现高知县人，明治时期政治家。维新后任参议，因征韩论下台。1874年建议设立民选议院，开始自由民权运动。1881年结成自由党，出任总理。1887年获得伯爵称号。中日甲午战争后，推动第二次伊藤内阁和自由党接近，任内务大臣。1898年又担任大隈内阁内务大臣。1900年退出政界，晚年从事社会改良运动。

② 岩仓具视（1825—1883），京都人，明治时期政治家，和萨摩、长州的倒幕派关系密切，在王政复古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维新后历任参与、议定、外务卿、右大臣，1871—1873年任特命全权大使视察欧美各国，回国后提倡优先国内治理。1881年建议制定宪法，1883年病逝。

③ 江藤新平（1834—1874），现佐贺县人，明治时期政治家，著有《论鄂罗斯橄》《图海策》，提倡攘夷、开国，建议迁都江户，主张中央集权。因率征韩论派和政府抗战被处斩。

施战略做准备。他建议精选密探数人前往清朝刺探情报,调查清朝的地理及其他事项,认为可将密探混于僧侣之中,也可根据具体情况和僧侣分开行动,这样5年之内就可以掌握清朝国情。一旦在外交上找到借口,立即出师问罪,一举征服清朝。届时或联合俄国共同出击,或策动俄国保持中立。所以西乡和副岛、板垣商议决定派出池上、武市和彭城装扮成商人前往满洲侦察。虽然池上、武市和西乡、板垣的关系密切,但派遣他们并非出于个人关系,当时是由各省选派数名人员经过训练后“百里挑一”选出来的,参加政府组织的军事行动。他们都是武官,所谓外务省十等出仕的职务只不过是临时挂的名分。彭城虽是真正的外务省职员,但他也和同行者一样装扮成商人,他的主要任务是做翻译。政府要求他们查清朝鲜对明治维新的态度,俄、清、朝之间的外交关系,爱新觉罗兴起之地的兵备、民政、人心所向,朝鲜派领历使见恭亲王要求他战余中保一事是否属实;尽可能详细记录各地地理、人情、民产,满、汉、俄、朝的语言使用区别,江河海边是否可以停泊舰船,货币的种类,物价的高低等。政府还指示他们物色去过清、俄、朝交界的洋人进行询问;雇佣清国人做翻译和向导;为保密可随时用化名、换服装;得到情报时密封寄回,或派一人先回国。他们本来是要以牛庄为根据地进行军事侦察,但由于3年前那里发过洪水,导致河川变浅,蒸汽船无法靠岸而改以营口为根据地。经过一年左右的活动,武市于1873年4月回国,彭城于7月回国,池上最后回国。他们记录了满洲的地形、政治、兵备、财政、产业、交通、气候、风俗、人情、物价等,观察了俄国人和朝鲜人在满洲的活动及贸易实况。可以说圆满地完成了外务卿副岛种臣^①交给的上述任务。

黑龙江会为编修《西南记传》到副岛种臣家里收集征韩论资料时,由于他生前烧毁了当时的全部书牒记录,他和西乡、江藤、岩仓等要人的信件一封都找不到,最后只在仓库里找到一个小盒子,里面藏有若干文件,《复命书》就是其中之一。36年后出版的《西南记传》:“公开这份资料证明当时的征韩论绝对不是空谈阔论。”显然,《复命书》很有分量,它给了征韩论派巨大的信心。

那么,征韩论和东北侦察有什么关系呢?征韩论派不是倒台了吗?

没错,以西乡为首的征韩论派是倒台了,他们很多人也都在西南战争中丧命了。但是非征韩论派并非不想征韩,只是认为为时过早而已,他们是要先搞内

^① 副岛种臣(1828—1905),现佐贺县人,明治时期政治家,东邦协会会长。维新后任参与、参议、外务卿,日清修好条规批准书的全权大使。1873年因征韩论下台。

政。征韩论的目的也并非只在朝鲜，它只是“大陆政策”的起点而已。明治初期，日本实行废藩置县后，势力和利益受到削弱的旧士族开始反抗，政府机构的腐败也越发严重，社会出现不稳定的现象，西乡等人正要给这些负能量找个宣泄的地方时，外交官佐田白茅^①和森山茂^②认为朝鲜对明治新政府“无礼”，建议征韩，于是就有了征韩论。如上所述，征韩行动搁浅了，但“大陆政策”依然进行，紧接而来的是“征台”。

明治初期，日本还没有中国地图，1871年兵部省内设立参谋局后，才开始掌管情报、制作地图。在连对方吃什么饭、睡什么床、天有多冷、路有多宽都一无所知的封塞时代，首次侦探的《复命书》留下了很多基本情报，无疑是留守政府的一大收获。这个收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日军所占领的地区和《复命书》几乎同出一辙。

13年后的1885年，日本已经巩固了直属天皇的参谋本部，情报侦察就更有组织地进行了。参谋本部的设立标志着近代日本军队已从国内防卫军转型为向外扩张的军队。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③不受内阁制约，在陆军省内自由发号施令，给了陆军将校很大的权利。明治初期日本在设计对外政策时靠的都是这些野心勃勃的年轻军人收集的资料。他们都学过测量，旅途中也都秘密携带测量器材。这个时期的侦察活动主要是对外国兵要地图进行实地测量。《纪行甲》作者的任务就是实地测量东北军事地形。我们细读《纪行甲》的话会发现这只是复命书的文字部分，参谋本部印发它（包括乙、丙、丁），扩大内部阅读范围自然有它的政治目的。它更重要的内容是只有目录而没有出现在《纪行甲》里的地图。很可惜的是找不到原图，不过在军用手册《满洲沿道志》上，到处可见菊地在满洲的“足迹”。

《纪行甲》的作者菊地节藏是一名身经百战的军人。1856年出生，静冈县士族，以秋田藩士为人所知（何时迁往秋田不详）。戊辰战争时，他谎报年龄跟着父亲参战。战后就学于兵学寮，毕业后进近卫联队，步兵少尉。西南战争时任小

① 佐田白茅（1832—1907），现福冈县人，明治时期外交官，1869年底任外务省判任出仕实地调查对马和朝鲜的关系，1870年回国后建议征韩。撰写自传《征韩论旧梦谈》。

② 森山茂（1842—1919），奈良人，明治时期外交官、政治家，继佐田后负责对朝鲜的外交工作，1890年任富山县知事，1894年任贵族院议员。

③ 山县有朋（1838—1922），现山口县人，明治、大正时期陆军军人，政治家。维新后从事陆军兵制改革，历任陆军卿、参议、参谋本部长、内务卿、首相。